

中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经济效应评估

——基于微观模拟模型的测算*

万相昱 唐亮 石雪梅 郑晓君

[摘要] 基于全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和现实需要的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 对当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及对可行性重点改革方案进行反事实模拟对照分析发现, 普惠性减税政策对于促进中国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与稳定社会就业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但当前企业所得税改革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错配问题, 导致政策效应不协调。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建议以降低税率为主要减税手段进一步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 同时兼顾企业行为反应, 平缓税率区间的跃迁幅度, 并有效防范改革进程对企业造成的短期冲击。研究为企业所得税改革提供可借鉴的量化参考依据, 并构建了中国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建模和应用的完备范式, 能够为相关研究和国家科学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方法论支撑。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 税收归宿 微观模拟 减税降费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0)10-0093-08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经济经历了异常艰难曲折的复苏进程。为应对潜在增速的下滑并提高国际竞争力, 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以减税为基本内容的改革方案。^① 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底签署了美国自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 并掀起全球范围减税浪潮, 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开始迈入低税时代。尽管学界对于“减税能够有效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向”这一议题仍存争议, 但可以确定的是,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被动陷入税收竞争格局, 必将对全球经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为应对国际复杂的经济形势, 缓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激发市场活力, 我国近年来也不断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继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 2019年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点针对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普惠性减税政策。而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及其后续经济影响的不断发酵, 更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正常运转带来巨大的外生冲击, 更大规模、更具效果、更加精准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 也是当前中央政府正在加紧研究落实的重点工作。

从当前施政目标看, 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方向是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究其目标靶向, 一是在微观经济层面, 旨在有效降低企业税负, 特别是积极改善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并强调引导企

* 本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综合集成模拟实验平台的设计与构建研究”(18AJL006)的支持。

作者简介 万相昱,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唐亮,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吉林 长春, 130000); 石雪梅、郑晓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732)。

OECD发布的《2018年税收政策改革》显示, 过去十几年间, OECD的36个成员国中有33个不同程度地下调了企业所得税税率, 平均税率从2000年的32.5%降低到了2018年的23.9%。

业投资和雇佣行为优化；二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线，主张结构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完善税收与公共支出的制度体系，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对宏观经济理论及相关模型提出了更高要求：量化追踪税制改革的微观归宿，精准估计微观个体的行为反应与状态，建立宏观—微观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与相互作用效果。这也成为相关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我国早期关于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研究着重分析我国企业税制收入与宏观环境的关系，对比国际税法税制，进而提出我国税制设计的相关政策建议。^{①②}随后，学者们通过构建比较静态分析环境、控制相关经济变量来分析税制改革对宏观经济或企业本身的影响。^③近年来，关于税收宏观模拟的研究开始出现。^{④⑤}总体来看，传统研究更多从宏观定性角度进行讨论，基于宏观经济总量或代表性个体的视角，以税制优化理论为基础，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方式提取税制改革的影响效应。尽管学界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财政政策的实施是社会成本巨大的经济活动，其评价和设计不能简单地依据主观定性或经验统计。回到当前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伴随减税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三新”加计扣除、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提升以及其他税收优惠与减免政策的实施，作为应税主体的微观企业，其营业行为同样将趋向于较大幅度的适应性调整，而这种适应性行为将导致企业财务表现得显著变动甚至大幅跃迁，造成预期减税值与实际减税值之间的重大偏差，也使得当前减税降费举措对于宏观经济的深层次影响难以被精确估量。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税收预测模型、税制改革的评估模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主体行为反应模型，以此精准计算税改的减税额度、评估对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影响，而这些是传统收入核算工具和经典经济建模工具难以实现的。

微观模拟（Micro-Simulation）模型的提出和实现，^⑥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有效思路，目前该模型已经成为公共政策评估最为有效的工具，而诸如欧盟国家税收—津贴模型（EUROMOD）、美国城市研究所收入转移模型（TRIM3）、澳大利亚国家经济建模中心静态收入模型（STINMOD）等一系列微观模拟模型越来越多地被政府部门采用。^{⑦⑧⑨}当然，现有微观模拟模型主要集中于自然人相关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的评价，对企业（公司）所得税改革的评估近10年来才成为前沿热点。尽管相关文献相对匮乏，但学者们已经在公司所得税改革与解决企业债务偏差领域取得集中突破。^{⑩⑪}然而，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目前并没有像其他转移支付领域一样被广泛应用。究其原因，应该是缺乏能够支持微观模拟的企业运营和纳税数据，而大多数抽样调查数据也无法支持分税种的研究。

在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微观模拟研究工作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学者们已经尝试将各种技术

① 邱华炳、刘磊：《税收弹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财政研究》1994年第6期。

② 王道树：《企业所得税收入归属机制研究》，《财贸经济》2007年第4期。

③ 刘磊、魏志梅、周华伟、付瑜：《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研究报告》，《税务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朱启荣、姚敏、杜才平：《中国降低企业税负的经济效应——基于GTAP模型的评估》，《经济学家》2018年第5期。

⑤ 刘忠、李殷：《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2年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自然实验》，《财贸经济》2019年第7期。

⑥ G. Orcutt, "A New Type of Socio-Economic Syst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9, no.2, 1957, pp.116-123.

⑦ A. Gupta, A. Kapur, *Microsimulation in Government Policy and Forecasting*,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2000, pp.1-7.

⑧ F. Bourguignon, A. Spadaro, "Microsimulation as a Tool for Evaluating Redistribution Poli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4, no.1, 2006, pp.77-106.

⑨ A. Harding, A. Gupta, "Modelling Our Future: Population Ageing, Social Security and Tax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a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07, pp.1-15.

⑩ C. Fuest, A. Peichl, T. Schaefer, "Is a Flat Tax Reform Feasible in a Grown-up Democracy of Western Europe? A Simulation Study for Germany",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vol.15, no.5, 2008, pp.620-636.

⑪ K. Finke, J. H. Heckemeyer, T. Reister et al., "Impact of Tax-Rate Cut Cum Base-Broadening Reforms on Heterogeneous Firms: Learning from the German Tax Reform of 2008", *FinanzArchiv: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vol.69, no.1, 2013, pp.72-114.

引入经济政策机理与效应的研究工作中,如郭绍禧(1986)、^①李善同(1990)、^②马雨诺等(2018)、^③万相昱(2018)^④等。然而,受限于数据技术和数据来源,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研究在国内尚处于空白。基于此,我们尝试利用相关企业调查数据并辅以汇算清缴大数据,建立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微观模拟模型,将现行企业所得税课征方案与可行性课征方案分别平行施加于微观个体之上,从而实现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效应和改革方案的模拟测算。

二、中国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

在保留数据异质性的条件下量化公共政策的微观归宿,是微观模拟模型的核心优势。一项公共政策改革最直观的作用效果,来自其对微观异质个体的经济状态的直接(即期)影响,而此类评估可以通过基于数据库技术的微观模拟模型得以实现:将宏观政策施加于微观个体,由此获得微观个体直接的状态变动信息,进而提炼政策效应。此外,公共政策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对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这构成了政策在中短期内的局部均衡效应。通过行为决策反应嵌入,我们可以进一步强化微观模拟模型的评价能力。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构建了中国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它以数据库模拟计算技术为基础,将目标政策体系和规则(典型如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或可行性改进方案)施加于微观个体(企业)之上,进而模拟测算企业运行状态的变化和潜在的行为决策模式,最终通过微观汇总来计算不同维度下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各种类型企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模型细分为五个模块,通过这些模块的依次执行,我们就可以评价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整的微观作用效果。其具体描述和实现技术如下。

第一,数据处理模块。微观模拟模型本质上具有数据禀赋依赖特征,其有效性与精准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代表性和误差水平。本项研究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2013年,样本量120875条),而为进一步核准企业信息,我们依据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大数据(2016—2019年,样本量2278万条)的宏观指标进行了校准。

第二,数据时化模块。微观数据的收集成本及可行性等现实条件决定了调查数据与目标数据存在间隔,这时就需要“时化”技术的引入。时化(Aging)是指把现有的微观数据样本用数学方法推算为计算期(或目标期)的样本,实现数据状态的转移,使更新后的微观数据更能反映目标期的客观状况,即解决数据如何“投影”到目标的问题。通常采用的时化方法有重新加权(reweighting)和等级提升(uprating)。^⑤具体而言,本项研究数据目标年份为2019年,被时化数据为企业经营收入,采取重新加权的方式,权重为2019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大数据中同行业同类型企业与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经营收入之商。另外,对于必需预测的数据,本研究尝试最大限度保持数据原有的异质性特征,利用个体的时间序列信息进行3期的加权移动平均(moving average)外推。

第三,政策实施模块(税法计算器)。政策实施模块是将待评价的公共政策按照其既定的实施规则模拟施加于微观个体之上的过程。在本项研究中,该模块实质上就是建立可编程的企业所得税税法计算器,它是整个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的核心模块,具体做法是把税法政策转换为计算机可识别的编程语言(SQL),使得计算机可以在数据库中的每一个纳税主体身上进行税法政策模拟,进而计算得出各个微观企业的应纳税额。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核算特点,税法计算器由以下3个部分组成:利润计算模拟、应纳税所得额模拟以及应纳税额模拟。

第四,行为模拟模块。本研究不对企业行为进行更为严格的同质化假设,也尽量避免参数化的函数

^① 郭绍禧:《一种有广泛应用前途的经济数学模型》,《光明日报》1986年5月28日。

^② 李善同:《微观分析模拟模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

^③ 马雨诺、王广慧:《“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制税收政策的微观模拟分析》,《经济视角》2018年第2期。

^④ 万相昱:《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改进的微观模拟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⑤ J. Merz, “Microsimulation—A Survey of Principles,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vol.7, no.1, 1991, pp.77-104.

规范，而是最大限度保留微观个体异质化的行为决策模式：对于本项研究中几乎不受企业所得税改革影响的企业外生行为，如企业基本情况的申报信息，我们假定在其他经济环境不变的条件下，每个企业保持行为决策不变；而对于研究中受到此次政策冲击显著的系统内生行为，如企业利润分配、投资额度以及雇佣人员数量等，则依据单个微观企业自身历史数据计算出来的收入弹性进行独立模拟测算。

第五，效应分析模块。该模块目标是在税法计算器和行为分析模块的基础上，以企业真实税负测算为核心，进行政策效应的归宿分析，精准测算企业所得税改革措施对微观企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即假设当其他条件不变而政策调整或结构性改革时，微观企业税负会计变动的直接影响。从实证性研究目标看，研究重点是模拟计算企业所得税改革与否所导致的微观效应的差分值，测算当前政策实现企业减税的精确额度及其对不同类型企业产生的深层次影响，进而累积估算当前改革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

三、企业所得税的微观模拟

(一) 企业所得税税率改革的情景模拟

1. 情景假设。

情景 1：企业所得税率下调至 20%/15%。目前世界上很多经济体的企业所得税率集中在 15%—20% 之间，我国很多学者都建议将企业所得税率降低至 20% 左右，为了与国际税率进行对比，本项研究在 20% 的基础上，增加了 15% 税率的模拟。

情景 2：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 15%/30%。如果只将企业所得税率降低至 15% 或 20%，一些特殊产业（企业所得税率低于 15%）将无法从中受益，这既不利于横向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国家对特殊产业的激励，因此本项研究假设所有企业在现有所得税率的基础上，同时降低 15% 或 30%，对于普通企业而言，其所得税率将会下降到 21.25% 与 17.5%。

情景 3：取消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率下调至 15%/20%。情景 3 是在情景 1 与情景 2 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改革方案，即取消现有的优惠税率，再将企业所得税率降至 15% 或 20%。

2. 对情景 1 的模拟分析。

企业所得税率降至 15% 时的整体效应大约是所得税率降至 20% 的两倍。当所得税率降至 20% 时，会增加 5.31% 的投资规模，会提高 5.95% 的营业收入，约提高 6.64% 的盈利能力。当企业所得税率降至 15% 时，对投资^①的影响大约是 10.35%，但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可以达到 13.07%。

表 1 情景 1 下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分析

	单位：%	所得税率降至 20%			所得税率降至 15%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总体		5.31	5.95	6.64	10.35	11.67	13.07
分行业	制造业	3.63	4.06	4.50	7.04	7.88	8.86
	非制造业	8.54	9.53	10.71	16.60	18.81	21.01
分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8.60	9.65	10.76	16.78	18.88	21.29
	非国有企业	4.02	4.51	5.02	7.80	8.83	9.85
分企业类型	普通企业	13.64	15.47	17.16	26.89	30.29	33.95
	特殊企业	0	0	0	1.32	1.46	2.23

注：特殊企业指的是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普通企业指的是按照 25% 法定税率缴税的企业，目前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率为 15%，小型微利企业为 20%。而对于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特定情形可按 10% 税率缴税，非居民企业特定情形所得按 10% 税率缴税。

分行业来看，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对非制造行业的影响更大，当所得税率降至 15% 时，非制造企业

① 这里的投资均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不包括无形资产投资。

的投资会增加 16.60%，营业收入会增加 18.81%，利润总额会增加 21.01%，这也说明减税降费对非制造企业的积极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分企业性质来看，降低所得税率对国有企业来说受益程度更高，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享受优惠税率的比例低于非国有企业（只是优惠税率，不包含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所以一旦税率下降，将比非国有企业受益更高。而从企业类型来看，只要是正常缴税的企业均可以从此政策中受益，呈现出覆盖面积广，受益力度大的特点。但对于已经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来说，当所得税率降至 20% 时，没有企业会从此项政策中受益，而当所得税率降至 15% 时，小型微利企业能够从中受益，但由于小微企业的减半征收政策以及大量小微企业还处于亏损状况，名义税率的降低对企业的影响会被冲减，大约能增加 1.32% 的投资，增加 2.23% 的利润总额。

3. 对情景 2 的模拟分析。

表 2 情景 2 下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分析

	单位：%	所得税率降低 15%			所得税率降低 30%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总体	10.03	11.30	12.33	19.56	21.72	24.89
分行业	制造业	10.02	11.27	12.37	19.46	21.45	24.66
	非制造业	10.05	11.36	12.21	19.77	22.22	25.32
分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10.19	11.60	12.59	20.11	22.65	25.53
	非国有企业	9.96	11.22	12.27	19.35	21.35	24.64
分企业类型	普通企业	10.27	13.26	12.06	20.36	23.02	25.63
	特殊企业	9.88	10.76	12.34	19.07	20.90	24.43

在情景 2 中，我们假定所有企业在现有税率的基础上再降低 15% 或 30%，可以看出，降低 30% 的政策效应大约是降低 15% 的两倍，但这种关系并不完全是线性的。具体来说，当企业所得税率降低 15% 时，投资会增加 10.03%，营业收入会增加 11.30%，利润总额会增加 12.33%；而当企业所得税率降低 30% 时，可以拉动 19.56% 的投资，营业收入会增加 21.72%，利润总额会提高 24.89%。与情景 1 相比，情景 2 中的政策受惠面积更广，税负变动对企业行为反应也更加强烈。

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税率变动的反应是较相似的，如当税率降低 15% 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都在 10% 左右，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在 10%—14% 左右，利润总额增幅在 12% 上下，这种较为均衡的变化有利于维持横向企业的税收公平性，保证不同类型的企业都能从税收改革中获益。

4. 对情景 3 的模拟分析。

情景 1 假定所得税率降至 15% 与 20%，对于部分享受了优惠税率的企业来说，影响程度较小。在情景 3 假定这部分企业享受的优惠税率政策消失，所有企业税率降至 15% 或 20%，这在现实情况中很

表 3 情景 3 下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分析

	单位：%	所得税率降至 20%			所得税率降至 15%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总体	-9.74	-10.72	-10.72	9.57	10.77	12.10
分行业	制造业	-13.99	-15.62	-16.68	6.52	7.29	8.27
	非制造业	-1.68	-1.39	-0.24	15.33	17.37	19.34
分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0.33	-0.53	0.01	16.42	18.46	20.85
	非国有企业	-13.44	-14.74	-14.97	6.89	7.76	8.67
分企业类型	普通企业	13.64	15.47	17.16	26.89	30.29	33.95
	特殊企业	-24.48	-27.31	-28.62	4.21	4.34	6.45

难实现，且不利于特殊产业的发展，因此情景 3 只是作为一个探索性的模拟。

在取消优惠税率并将所得税率降至 20% 时，可以发现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说明我国绝大部分企业都享受了国家的优惠税率政策，一旦取消优惠税率，即使将税率下调到 20% 也会带来反向效应，其中享受优惠较多的制造业、非国有企业与特殊企业对此政策的反应比较敏感。如果取消优惠税率但将所得税率降至 15% 时，则整体效应会变为正向影响，并且对于原本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其影响依旧为正，说明所得税率的下调足以弥补其损失，其也可以从税率改革中获益。

(二)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改革的灵敏度模拟

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 2018 年开始由之前的 50% 提高为 75%，并且惠及所有行业。为了模拟评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微观模拟方法，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设定为 5 个情景：100%、125%、150%、175% 和 200%，针对每一情景下的企业 R&D 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模拟评估。为了观察企业异质性，按照企业规模、^① 技术水平^② 和所有权性质进行分组统计，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观察不同加计扣除比例时企业 R&D 支出的改变。总体条件下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加计扣除比例对企业 R&D 支出的影响并非线性单调，而是呈现先递增后降低的倒“U”特征。五种情景下企业 R&D 支出增加比例分别为 0.477、0.602、0.632、0.635 和 0.609。加计扣除比例为 175% 时，企业的 R&D 支出增加幅度较之前有所降低，继续提高加计扣除比例到 200%，企业的 R&D 支出增长降低，基本与加计扣除比例为 125% 时的 0.602 相当。以上特征说明当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时，并非扣除比例越高越好，而是存在最大化企业研发投入的合理区间。

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基于规模、技术水平和所有制的分组结果与总体条件时具有相同特征，研发加计扣除比例与 R&D 支出之间呈现明显的倒 U 型关系，加计扣除比例存在合理区间，使得政策效果达到最优。具体来看，研发加计扣除对大规模、高技术、非国有企业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他分组企业。在不同研发扣除比例下，大规模企业的 R&D 支出变动分别为 0.439、0.564、0.564、0.497 和 0.457，而小规模企业为 0.355、0.355、0.455、0.455 和 0.428。高技术水平企业的 R&D 支出变动为 0.731、0.803、0.831、0.814 和 0.764，一般技术水平企业为 0.326、0.406、0.400、0.392 和 0.393。国有企业为 0.507、0.632、0.632、0.629 和 0.630，非国有企业为 0.611、0.611、0.711、0.645 和 0.678。

表 4 不同扣除比例下的 R&D 支出变动

分组	研发扣除比例的情景设定				
	100%	125%	150%	175%	200%
总体	0.477	0.602	0.632	0.635	0.609
大规模企业	0.439	0.564	0.564	0.497	0.457
小规模企业	0.355	0.355	0.455	0.455	0.428
高技术企业	0.731	0.803	0.831	0.814	0.764
一般技术企业	0.326	0.406	0.400	0.392	0.393
国有企业	0.507	0.632	0.632	0.629	0.630
非国有企业	0.611	0.611	0.711	0.645	0.678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也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度量企业技术进步水平，针对不同情景下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进行企业全要素生

^① 基于中位数分组。

^② 高技术企业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传播、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产率的模拟估算，结果如表 5 所示。总体条件下，五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为 0.106、0.118、0.129、0.129 和 0.127。不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 R&D 投入一样并非线性单调，同样存在最优区间，大约在 175% 左右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开始降低。

企业异质性同样十分明显。大规模、高技术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显著高于其他分组企业。与总体条件下的特征相似，加计扣除比例并非越高越好，175% 左右时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合理区间。不同研发扣除比例时，大规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为 0.115、0.140、0.137、0.127 和 0.100，而小规模企业为 0.046、0.056、0.067、0.065 和 0.065。高技术水平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 0.142、0.162、0.172、0.170 和 0.171，一般技术水平企业为 0.049、0.089、0.110、0.120 和 0.108。国有企业为 0.058、0.060、0.060、0.061 和 0.059，非国有企业为 0.122、0.142、0.151、0.170 和 0.158。

表 5 不同扣除比例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分组	情景设定				
	100%	125%	150%	175%	200%
总体	0.106	0.118	0.129	0.129	0.127
大规模企业	0.115	0.140	0.137	0.127	0.100
小规模企业	0.046	0.056	0.067	0.065	0.065
高技术企业	0.142	0.162	0.172	0.170	0.171
一般技术企业	0.049	0.089	0.110	0.120	0.108
国有企业	0.058	0.060	0.061	0.061	0.059
非国有企业	0.122	0.142	0.151	0.170	0.158

(三) 小微企业认定条件改革的灵敏度模拟

回顾我国小微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基本围绕在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上，^①因此本研究基于应纳税所得额的变化进行了一些情景模拟，分为 100 万元、300 万元、400 万元与 500 万元，并假设：第一，由于只涉及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不涉及资产总额与从业人数的更改，小微企业的界定依旧采用 2018 年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工业企业为 3000 万）、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工业企业为 100 人）的标准。第二，使用超额累计计税方法，如应纳税所得额调整到 300 万元，则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小于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为 5%，而大于 100 万元小于 300 万元的部分，按 20% 税率减半征收，实际税率为 10%，其他同理。

表 6 小微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调整模拟结果

	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			
	100 万	300 万	400 万	500 万
新增减税额	56.2 亿	316.92 亿	554.29 亿	835.12 亿
新增小微企业数量	3.92 万	8.61 万	10.56 万	12.38 万
新增投资额	235.67 亿	638.11 亿	857.94 亿	1122.73 亿
新增就业人数	16.16 万	39.02 万	55.49 万	114.16 万
新增利润总额	59.27 亿	157.75 亿	235.50 亿	316.89 亿

根据我们模拟的结果可以发现，当应纳税所得额依次提高至 100 万元、300 万元、400 万元和 500 万元时，小微企业的数量增长在逐渐放缓，这也是因为随着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对应的小微企业数量

^① 2008 年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的小微企业按 20% 的优惠税率征税；2009 年在此基础上，应纳税不超过 3 万的小微企业按 20% 税率减半征收，税率降到 10%。2009—2018 年这 10 年时间，国家逐步降低小微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减半征收的标准，使得更多小微企业能够享受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对小微企业的优惠力度也在逐渐加强。2019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此次减税政策与往年相比，覆盖范围最广，优惠力度最大。

在逐渐下降，大部分的小微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因此提高应纳税所得额对于小微企业的认定数量的作用有限。但随着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减税效应、就业效应、盈利效应以及投资效应则呈现上升趋势，因为应纳税所得额越高的企业，减税效应越显著，企业能享受的优惠金额更高。这类企业一般规模比较大，雇佣的员工数量较多，一旦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则对于社会经济贡献更大。但随着减税额度对于认定标准的弹性系数不断攀升，企业将面临更大程度的潜在税收优惠，这必然导致大量企业调整申报结构和相应额度，从而获得避税空间，或者加剧逃税发生的可能。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微观模拟技术是构建反事实模拟环境的有效工具，它以系统科学还原论为基础，在数据仿真的条件下，建立对政策可行性改革空间进行对照实验的环境，并对各个政策参数进行灵敏度实验，从而为各种改革方案和细节提供量化评价机制，最终为政策设计和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基于本文建立的中国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以及相关企业微观数据，我们对中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评估，研究发现：（1）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模拟结果看，进一步减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提高利润，间接促进投资和就业，且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幅与企业营收状况的增幅基本成正比，即企业所得税率每降低 15%，企业营收、利润和投资增加均接近 10%；由于我国目前大部分企业普遍享受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减征优惠，因此单纯调整企业所得税的比例税率值是难以有效覆盖全体的，对于已享受税率优惠的企业而言，直接受益并不显著；兼顾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已经形成的企业税收负担不平等以及可能导致企业避税申报等消极行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重点集中于现有高税负企业的减税，以及对于边际税率累进跃迁幅度过大的抑制。（2）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模拟结果看，加计扣除比例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呈现先递增后降低的特征，不断提升企业研发支出的加计扣除并不能持续提升企业投资，反而会增加相关目标计税和课征成本，并增加企业通过财务手段避税甚至逃税的动机和风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也并未呈现单调递增的关系，即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政策目标下存在最优加计扣除比例值。（3）从小微企业认定条件的模拟结果看，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认定标准能够加大减税力度，但这在提高财政压力的同时会提高计税和课征成本，更会形成显著的税率悬崖，从而降低部分企业如实填报的意愿和对税收的遵从度，造成国家税源流失，并加大财政治理工作的压力。

进一步地，依据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的模拟输出结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我们给出关于我国企业所得税及相关领域改革的若干建议。首先，建议以降低税率为主要减税手段进一步推进企业所得税的改革，适度优化税制结构，同时为应对未来改革攻坚重任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应努力确保税负公平且税基稳定。其次，当前的政策参数设定，特别是小微企业认定标准和计税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或实际税率出现跃迁，这不仅要妨害税负的公平性原则，也可能加剧企业应对性的避税和逃税行为，从而损害国家财政治理能力，建议未来改革要重点关注税率区间的平缓设置，适度引导企业的行为反应。最后，在持续严监管的背景下以及当前疫情次生灾害冲击不断显现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可能面临极其严峻的短期冲击，中央政府要做好地方政府的缓冲，地方政府要做好企业缓冲，积极主动作为，加大综合扶植力度，在税收征缴方面给予企业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做好企业应对风险的第一道缓冲和最后一道防线。

责任编辑：张超